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研讨交流活动举办。创作、表演、理论、教育、院团管理的各方代表齐聚一堂,共探民族管弦乐的行业前景、创作创新与传播传承。

◀ 研讨交流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从“高原”到“高峰”——

新时代民族管弦乐创作的转向与进路

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王 莘

回顾历史,中国民族管弦乐走过了一条从“拿来主义”到“本土觉醒”的曲折道路。特别是近10年,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的作品序列拿出来做纵向的切片分析,会发现一条极其清晰的脉络:民族管弦乐正在摆脱西方交响乐的影子,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外化,表现为以中华文明为母题,以民族乐器本体音色为语法,以现代作曲技术为工

具,重新组织声音秩序。我认为,当下的创作至少呈现出4个鲜明的转向:

第一,题材视野的宏大化,从“写意山水”走向“文明叙事”。过去的民乐创作,往往喜欢寄情山水,标题常取“春”“月”“山”“河”等。现在的头部作品,敢于触碰那些关乎民族脊梁、国家命运的大命题。这种转变,不仅是题目内涵变大,也体

现出作曲家开始自觉地用管弦乐的宏大叙事能力,去承载中华文明的精神重量。

第二,音乐语汇的在地化,从“元素拼贴”走向“方言转译”。很长一段时间,民乐创作陷入了符号化的误区。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成熟的作曲家正在进行一种深度的方言转译。以《永远的山丹丹》为例,王丹红并没有简单地引用信天游,

而是深入挖掘陕北说书、腰鼓的律动内核,将其拆解、重构,融入现代管弦乐的节奏群与配器逻辑中。听众能清晰地辨认出“这是陕北”,但同时又能感受到“这是今天的交响”。这种转译,是消化后的再生,是真正的创造性转化。

第三,结构思维的戏剧化,从“单乐章炫技”走向“套曲化建构”。当下,我们的作曲家已经不再满足于写出一段好听的旋律,而是开始向歌剧、话剧甚至影视艺术学习,获得更为复杂的情感表达和戏剧冲突能力。交响性的本质,在于时间的建筑艺术,在于结构的逻辑力量。

第四,创作生态的协同化,从

“个人写作”走向“院团共建”。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是天才关起门来一蹴而就的。近年来涌现的多部优秀作品,都是各民族管弦乐团委约的成果。这次展演本身,就是文化和旅游部引导、地方政府承接、院团落地实施的系统工程。中国音协一直倡导“有组织的创作”,就是要打破个体创作的局限性,建立“采风一委约一排练一演出—修改”的完整闭环。

当下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创作成果,共同回答了新时代民乐创作面临的几个核心命题。首先,是关于中国旋律的书写方式。民族旋律的现代性,关键在于气口和句法的创新,而不是对调式的简单扭曲。其次,是关

于宏大主题的落地路径。大主题最怕空,只有具象的细节才能支撑起抽象的价值。再次,是关于青年才俊的成长模式。青年作曲家的创作,展现出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技术手段。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根始终扎在民乐的土壤里,这正是中国民乐未来的希望所在。

展望未来,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民族管弦乐高质量发展,中国音协愿与各方携手,实施“青年创作人才战略”,探索建立“民族管弦乐保留曲目滚动目录”,推动“深扎”活动制度化,加快理论建设步伐,拓宽国际传播的接口。让我们深植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回应时代召唤,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扎根时代沃土,谱写民族新声

——新时代民族管弦乐创作思考

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艺术总监 王丹红

民族管弦乐积淀中华美学与文化基因,从传统古曲的文人意趣到近现代作品的家国情怀,其发展始终与民族命运、时代进程同频共振。作为深耕民乐创作一线的文艺工作者,我始终在思考:在艺术形态多元交融的当下,如何传承民族音乐根脉,用专业创作回应时代命题,让千年民乐焕发全新生命力?

首先,守正固本,以传统根脉筑牢创作底色。中国民族管弦乐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源自独有的音色体系、韵律逻辑与东方审美。我们的创新绝非割裂传统、照搬外来艺术语言,而是立足民族音乐本体,对经典素材、传统技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地民间音乐、传统戏曲

等,都是取之不尽的创作宝库。

其次,直面现实,以史诗叙事彰显国家院团艺术力量。本次展演中,中央民族乐团携原创民族交响作品《畅想京津冀》登台。创作中,我突破传统民乐偏于温婉抒情的表达惯性,运用强戏剧结构、极致音色对比,富有冲击力的织体语言,层层铺展情绪脉络。实践证明,中国民族管弦乐完全具备驾驭重大现实题材、承载史诗格局的艺术能力,国家级院团更要发挥引领作用,让民乐既能抒山水之情,更能铸时代之魂。

再次,创新发展,以专业表达创造当代审美语境。当下观众的审美视野更为开阔,对音乐的结构、织体、舞台呈现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创作者,我

们既要深耕传统技法,也要吸纳现代作曲思维、交响化发展逻辑,在曲式结构、声部布局、音响设计上持续突破。

最后,心怀担当,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人民至上》中,我的作品《山水欢歌》为音乐会第五乐章开篇。《山水欢歌》勾勒出秀美的山河画卷,诉说着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欢快的曲调里,满是百姓安居乐业、畅享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此次创作让我感受到,身处信息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工具在变、传播媒介在变,但“为谁而写”的答案从未改变。高品质的艺术作品,要让人民在其中照见自己的生活、感受精神的滋养,在烟火气中提纯心灵、在旋律中获得力量。

响应新时代召唤,坚持为人民创作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东升

作为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青年创作人才研修班”的带班班主任,我与20位青年才俊共度为期一周紧张充实的学习时光,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民族音乐鲜活的未来。

这些年,国家艺术基金持续发力,为原创音乐创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乐团展演搭建起院团竞艺互鉴的高端平台,地方乐种展演让藏在乡土深处的笙管丝弦重新被听见。小型室内乐的扶持催生各种类型新的组合与表现形式,让传统在多元形态中获得新的生命。面向青年创作人才的培养孵化机制不断完善,一批优秀的青年作曲家正在茁壮成长并大显身手。

繁荣之下,我们必须看到,作品数量的增长并不天然等于艺术质量的提升,创作热情的高涨更需要创作方向的清醒。民族音乐创作的根本方向,

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一部作品好不好,不仅要看它能否走进音乐厅的节目单,更要看它能否走进人的心里。

与此同时,院校与院团之间、小众审美与大众需求之间,客观上还存在差异甚至隔阂。院校偏学理、偏前沿,院团重舞台、重观众;专业圈内的审美大多是追求音乐语言的突破,广大观众期待的是听得懂、有温度的声音。这组分歧,说到底专业小众审美与大众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这个矛盾在我们研修班里是“活”的。班上既有院校高学历背景的优秀教师,也有院团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创作骨干。他们通过这次研修,不仅结下友谊,在艺术观念上也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同。这说明,面对差异,出路在于互通有无、求同存异。院校应引导师生放下总谱、

走进院团,走进剧场,多与观众接触,补上大众审美这一课;院团则要给创作者更多包容与试错的空间,让学术探索有机会在舞台上试一试、磨一磨。

综上,我将其总结为关于创作的“四个修为”。第一,时代感召。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时代的命题和当下的立场,面对这个时代,我们拿什么去回应?第二,民族文脉。对自己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根脉与文化资源,要有深刻的理解和真切的体认。第三,艺术传统。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品种要有深度的吸收和理解,写民族管弦乐,就要对民族管弦乐的艺术传统、发展脉络有深入的把握。第四,个人禀赋。时代感召、民族文脉、艺术传统,最终都要经由艺术家内在的禀赋,进行个体的深度化解、体悟和思考,这决定了我们最终能拿出什么样的精品。

新时代民族管弦乐创作有感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 李博祥

结合自身多年创作实践、一线教学经验,我围绕民族管弦乐的当代创作分享个人的思考与探索。

首先,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作底色。近年来,中国各地民族乐团打造推出的各类民族管弦乐作品被广泛传播,深受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喜爱,创作题材也走向多元,在民族管弦乐器的特色之上逐渐形成了中国民族乐队的创作理论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民族管弦乐创作正在守正创新的路上,不断诞生契合中国审美、彰显中国气质、承载中国精神的原创民族音乐作品。2018年我创作了民族交响史诗《英雄》,2020年创作了民族音乐史诗《紫禁城》,2022年创作了《听见·大运河》。这3部作品都是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为载体,用民族乐器之声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其次,坚持把时代精神与个人追求有机融合。新时代民族管弦乐创作的根本在于始终扎根时代沃土,坚守人民立场。我们既要笃定纯粹的艺术初心与专业理想,秉持严谨踏实、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摒弃当下文艺创作中浮躁功利、急于求成的不良风气,更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贴合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创新发展,真切倾听、深度捕捉人民群众日益多元、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作品既具备扎实的专业高度、精湛的技术深度、厚重的文化底蕴,又饱含时代气息与人文温度。

2019年,我为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创作了二胡协奏曲《初心》。创作过程中,我依托二胡独特的抒情特质与贴近人声的声腔质感,除了娓娓道来的旋律主线,还在快板段落大量运用同音同律连段弓演奏技法。这需要演奏者在长时间

连贯演奏中,实现握力、腕力、臂力的高度协同、稳定统一。这种持之以恒的演奏状态,与《初心》所表达的持之以恒的信念坚守相契合。

最后,坚持把民族音乐创作作为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着力点。新时代民族音乐的创新、民族音乐创作人才的培育、民族音乐创作的学科发展,高校是核心阵地之一。

2024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作曲专业正式回归作曲指挥系。为了让学生更了解民族管弦乐、提升民族乐队写作能力,学院为民族音乐作曲专业开设《中国传统乐种与民乐经典解析》《民族管弦乐法》等课程。同时,民族音乐创作课程体系的建设还在持续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使培养的人才既能深耕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也能投身社会美育、文化传播与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建设。

艺术场景里的新时代

——文化传承视域下中国民乐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委员会委员 吴玉霞

中国民乐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厚底蕴和浓郁色彩的器乐艺术,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情感。探索音乐创作委约制模式,吸引专家人才投入民族管弦乐艺术创作,形成资源共享、团结协作的矩阵,是新时代民乐发展的重要路径。

今年4月,25场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汇集于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等舞台,13位指挥、28支乐团、80多位民乐独奏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奏家、艺术团竞相献艺。同期,国家大剧院内,张鸣指挥北京民族乐团,联手全国多地150人阵容带来《胜利之光》音乐会。这部集聚14家民族乐团的联合委约之作,用民族管弦乐艺术镌刻历史丰碑。7月17日,

中国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委约作曲家王云飞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长征》,展现了中国民乐的守正创新。

从以往相对单一的创演模式到如今的“百花争艳”和“抱团聚力”,民乐艺术有了新的活力。由湖南湘剧院湖湘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长岛颂歌》,入选本次“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作品灵感依托湖湘文化,旋律骨架由长沙弹词常见的核心音组成,伴随琵琶丰富的技指法编排,以独特的音乐色彩表现了弹词说唱与琵琶弹奏的灵动。

在追求“短平快”效益的市场氛围下,如何保持民乐文化自身的特质?传统是我们的精神底色,情感、

气韵、格调三重之境是艺者长期践行的修为和目标。重技术轻艺术、重形式轻内容,是现实艺术传播与音乐教育理念存在的偏差和误区。区分通俗和庸俗,需要从业者主动发力。

第十八届文华奖及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获奖作品反映了当代音乐创作的最新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少青年人的技术能力和提升空间。当新作数量与日俱增、传播手段日益多样,民乐创作势必厘清思路。从音乐创作、审美表达、团队建设等多维视域探讨中国民乐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而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是我们探寻艺术规律、审核艺术标准、拓展艺术审美的依据。

创作彰显时代精神、雅俗共赏的民族管弦乐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创作委员会主任 刘长远

2003年,我完成了第一部民族管弦乐作品《抒情变奏曲》。我希望拓展民族管弦乐的表现边界,在一部作品里容纳多元音乐语言,让听众更好地理解现代民乐。此后,我不断探索,力求将传统民族音乐底蕴与现代作曲技法相融,先后创作《龙跃东方》《未来的希望》等民族管弦乐作品。此外,我也尝试跨界融合,探索民族乐器与交响乐队结合的更多可能性。

近些年,我的创作重心逐步转向大型民族交响史诗,通过宏大体裁挖掘中华历史文化内涵。其中,第五交响乐《光明》斩获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作品奖。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携这部作品赴欧洲巡演,为中国民族音乐赢得国际声誉。

多年创作路上,我始终追求创作出雅俗共赏、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经

典。围绕这个目标,我有以下体会: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展现当代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是民乐创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一部作品想要深入人心、代代流传,核心是把握“真、善、美”这一主题。情感真挚,摒弃浮夸、虚假;音乐富有温度、触动人心,引发听众情感共鸣;依靠音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唤醒大众审美,陶冶听众情操。

能够载入史册、成为传世精品的音乐,必然做到雅俗共赏。面向专业音乐人,作品要有严谨成熟的作曲架构,带有作曲家鲜明的个人风格,都不能单纯追逐技法猎奇;面向广大普通听众,要让大众听得懂、记得住主旋律,感知音乐承载的情绪,但不一味迎合大众审美,以致丧失交响性与戏剧张力。

创作必须坚守原创,丰富的经典曲

调、各民族民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库,但不能简单照搬、直接复制,而是吸收传统音乐的内核与神韵,融会贯通,创造全新旋律。优秀作品需要长期酝酿沉淀,切忌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创作数量,耐心雕琢才有可能诞生经得起舞台与时间检验的佳作。一部优秀作品走向经典,还需要长久的舞台历练。经过舞台大浪淘沙,更多佳作才能脱颖而出。

创作视野应当更加开阔,题材布局多元均衡。中小型作品与大型民族交响作品同等重要,既要描绘节日盛景、民俗风情、地域特色的乐曲,也要深耕重大题材,拓宽民族管弦乐的表达边界。

民族管弦乐植根中国,面向世界。继西洋管弦乐之后,民族管弦乐队开辟了一片崭新的交响天地。全球音乐家都在不断寻找全新的交响表达形式,而这片新天地就在中国。

用传统戏曲音乐赋能当代音乐创作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一级作曲 方可杰

组合,使戏曲风格更加浓烈和别致。

我长期关注河南戏曲的主奏乐器,如河南曲剧的曲胡。它是为数不多的无千斤指板式弓弦乐器,音色很接近人声,但多年来技法发展缓慢。我和演奏家合作挖掘其潜力,创作了《新年大起板》《往事》等作品。在《往事》中,我把曲胡的音域从传统的2个八度扩展到近3个八度,中间还有向下五音连续离调的手法,逐步拓展乐器的表现力。

像这样不常见的乐器,河南民间还有很多。2023年,在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举办的闵惠芬二胡艺术周上,我和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共同主持了一场音乐会,河南不同剧种、曲种的主奏乐器一一上台,有四胡、坠胡、曲胡、板胡等,精彩的演奏让观众大开眼界。尤其是河南宛梆的板胡,声音很高,演奏技法别致。

戏曲乐队是民族管弦乐的重要分支。近年来,戏曲乐队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演奏水平日益提高,由单纯的伴奏逐步向音乐会表演发展。如河南豫剧院三团,就拥有一支中西混合的乐队。河南曲剧团则是一支纯粹的民族乐队,由曲胡、琵琶、三弦、古筝、二胡及民族吹打乐组成,他们改编曲牌和唱腔,创作了古筝独奏《风雪缘》、二胡独奏《怀念》等戏曲风格的器乐曲。

当前,我国民族管弦乐的创作队伍,基本还是从学习西方作曲理论起步。民族管弦乐创作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许多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在乐队建制方面,如何使其编制更加科学,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在创作方面,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从戏曲音乐中汲取营养……这些仍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